



现代汉语新词语 构造机理研究

CCxG Approach to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刘玉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新词语 构造机理研究

CCxG Approach to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刘玉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 / 刘玉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351 - 2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汉语 - 新词语 - 研究 IV. ①H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89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92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一

石 坚

刘玉梅在四川大学读博期间，在人品、学品和文品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自2010年毕业以来，玉梅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一步雕琢，并取得国家社科后期资助。今闻玉梅《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即将出版，请我为序，作为她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我甚感欣慰。

构式语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一个新兴语法流派，主要聚焦于超句法层面的构式研究。玉梅潜心读书，积极主动地探索学科前沿信息，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能学以致用。她从构式语法理论背景出发提出了解决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的分析框架，这和她平时的认真踏实、细心钻研和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记得她最早观察分析的一个语言学案例是：英文的 bar 一词为什么译为“酒吧”，而不是“吧”，是不是像汉语界所说的那样，“酒”是一个羡余成分，“吧”仅是一个词缀而已？通过理论溯源和语料分析，玉梅终于找到了新的解释方案。以此为基础，她紧扣构式语法理论基本观点，通过观察更多语言事实发现该理论的问题与不足，建构了自己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汉语新词语构式的研究，为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甚至词汇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该书从认知性和概括性承诺出发，以整合性模型中的认知参照点为标准对新词语重新分类，并以封闭语料为支撑对新造构式、缩略构式和外来构式的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压传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佐以详实的数据，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现代汉语新词语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机制。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结构完整，语料翔实，在分析新造构式、缩略构式和外来构式上有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创新，并先后发表了《Goldberg 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反思与前瞻》、《“数 X 构式”认知新解》、《“吧”族词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缩略词语形成的动因及认知限制条件》、《认知词汇学》、《语式形成的多重压传机制》、《论构式压制的多重互动性》、《外来词语形成的认知机理》等文章，得到学界的认同和赞赏。

2 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

玉梅在吸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譬如构式本位观、多重压传观、完全图式性构式、部分图式性构式、零图式性构式、概括创新观、最大表达力原则、最大经济化原则、认知参照点准则、统计先用准则等等不一而足。这也充分体现了玉梅在该领域亦已较好地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良好的独立科研工作的能力。

博士毕业后，玉梅在专业研究中坚持不懈，潜心思考，跟踪前沿，不断拓展学术视野，终在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认知词汇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去年又喜闻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令我深表欣慰！终究梅花香自苦寒来！

于川大望江

2014年1月25日

序 二

王 寅

刘玉梅教授新作《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即将付梓，请我为序，作为她的老师和同事，我深感欣慰，大有“老松喜迎新竹枝”的幸福感。

我与玉梅相识于2004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时为四川外语学院）的一场学术报告上（那时我刚调入该校）。她敏捷的思路、踏实的学风和探索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7年玉梅辞去行政职务，师从我在四川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从同事发展为师生关系的近十年里，我目睹了玉梅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成长的点点滴滴。她踏实认真，刻苦钻研，汲取多学科专业领域的营养，在广泛阅读哲学（包括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汉语语言学等书籍的基础上，大量涉猎了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前沿书籍和文章，这为她后来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撰写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路上师生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玉梅终究没让我失望，她的博士论文《基于多重压传观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得到学界专家高度赞赏和评价，并先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外语》、《外国语文》、《山东外语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十数篇高质量论文。此后，她又不断修改和完善，于2013年修订为《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这是学界对她认可的最好证明。现今书稿即将付梓，实在是可喜可贺！

国内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主要是从构词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修辞学和文化等视角考察新词语产生的原因与途径、构成方式与表义特征、分类与规范、词源与理据等，对新词语产生的认知动因和机制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这本书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广义构式语法和构式本位观的主张，并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进一步提出

了研究新词语构造机理的理论模型——基于认知参照点的多重压传模型(CRP-based Poly-Coercion-Inheritance Approach)。论文且还以“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历时与共时”、“语料调查法”等为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反思和全景式语料验证,在理论模型下对三类现代汉语新词语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机制作出了较为统一、全面而深入的解释,论文充满着闪光和独到之处。

首先,作者选择了考察现代汉语新词语的制高点——构式语法,这是前人所未发之处。我们知道,构式语法理论是一批学者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中对TG语法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新语法理论体系,主要对语言各层面的句法、语义、语用作一整合性研究,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并被不断加以深入和扩大,亦已形成一股强劲的趋势,从而出现了近十几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对语法理论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式语法”上的现象(Croft & Cruse, 2004: 225),很多学者已经将其视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理论的一个集合名词。构式语法基于这一立场,既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又关注普遍现象,认为核心和边缘表达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都应受到关注。但是,国内外大多数研究常关注句法层面的构式语法研究,如我所撰写的《构式语法研究(上下卷)》也主要聚焦于词层面以上的构式,而对词汇,尤其是新词语的构式语法研究关注不够。玉梅的这一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填补了这一空白。她从构式整体观的角度出发,将新词语视为一种新创构式,在形成过程中受到“音律、句法、语义、语用”等原有构式信息的压制,从各个层面都传承到了新特征,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新性”。该研究能紧跟当代学术前沿,以认知构式语法相关理论为背景,另辟蹊径,建构了自己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认知参照点的多重压传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新词语正是人们在体验性范畴化和概念化活动中启动了存储于心智中的构式网络知识,在不同已有构式的多重压传下形成了不同的新创构式。不同的压传力和路径又导致了新词语具有不同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该研究一方面扩大了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范围,修补了相关理论之不足;另一方面也为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进路。书中在理论上所体现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代表着当前国内语言学界(包括外语界和汉语界)的前沿方向,这才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该书在应用上也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以及较高的实践意义。在分析上结合了定性兼定量的取向,有较高的指导意义。研究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有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创新。譬如,该研究从认知

角度出发将新词语分为“新造构式”、“缩略构式”和“外来构式”三大类，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下重新界定音律、句法、语义、语用和修辞构式，并以封闭语料为支撑对这三类构式的各层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佐以详实的数据。尤其在缩略构式和外来构式的分析上提出了前所未发的见解。譬如，作者依据缩略词语和原词语的映射关系提出，缩略并非是任意、无序、无条件的，而是受到一定认知条件的限制以及具有较高认知凸显度的已有构式的压制。她认为，为获得“简洁、经济、省力”的交际效果，并确保交际信息的流畅传递，缩略构式一般遵守两个基本原则：最大经济化和最大表达力，后者包括认知参照点准则和统计先用准则，并通过构式压传巧妙地阐释了缩合构式、截略构式和统提构式三小类不同缩略构式的构造机理。再比如，作者认为，融“音、形、义、用”于一身的源语词语构式，为外来新词语的创构提供了多种认知参照点的潜势，可分别以“语音、书写、语音+语义、语音+词法+语义、语义+词法、语义”等为认知参照点，并激活源语和汉语构式知识对外来新词语的创构形成压传作用。外来词语一旦引进，通过使用便可固化为汉语词语系统中的一员。作者将这类视为既成外来词语构式，并应用统一的分析方法来阐释此类外来新词语的成因，突破了前人从单一视角考察外来词语的局限，而是从“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多维视角加以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在2012年全国第二届认知神经语言学大会上，玉梅作了题为“外来新词语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的大会发言，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得到与会学者（包括语言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赏。

再次，该研究不但体现出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继承创新精神，还体现了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不但应用了归纳与演绎法，还通过语料调查法，从历时与共时平面对现代汉语新词语的构造机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克服了“拍脑袋做结论”研究思路之缺陷。文中语料新鲜翔实、丰富全面，每一个观点和分析都有大量的语料和数据作支撑，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也使得理论分析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所有这些都蕴涵了作者的一番苦功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政论文必须有“论点（Argument）”和“论据（Argumentation）”，这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教诲，而却被我们的研究生所忘却，这真有点说不过去。

有些论文没有明确的论点，或交代不清，强调不够；还有些论文论证了一些不需要论证的观点，岂不是犯了“画蛇添足”的毛病。更有一些全文照抄国外学者的理论，然后换用些中文例子，人们不仅要问，我们凭

什么光为老外忙乎，而想不到建我理论？

就论据而言，常有随便举例的习惯，随意性太强，殊不知人们还可随手举出很多反例，这就大大降低了政论文的说服力。当然还有些论点与论据脱节，即所用例子不能用来很好地支撑论点，提供了些与论点无关或关系不很紧密的论据，终使论文落得一个后语不搭前言下场。

而玉梅这本书有自己的新论点，也以语料库为充分论据。如何发现新论点，可行之法便是以马克思为榜样，他一方面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且将两者中的合理内核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或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可对其进行互补性处理，将它们进行有机整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长补短”，这也是一种创新！这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科研方法的一点心得，以飨读者。

当然，任何研究都难免挂一漏万，此书当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譬如该模型的普适性问题还有待更多语种语料的实证检验，以及修辞构式如何在构词中发挥作用等，尚需深入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玉梅博士毕业后，虽又服从学校安排兼任了行政工作，但学术上仍孜孜不倦，不断进取，跟踪前沿，不断有新作发表，还给研究生开设了《语义学》和《构式语法》两门课程，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认可和赞扬。她也不断开拓构式语法研究的新领域——修辞的构式语法研究，并于2012年申请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束定芳教授继续从事构式语法研究。2013年玉梅的博士后课题还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一等资助。我相信她一定会在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领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且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带路人！

重庆·大川水岸

2013年11月28日

中文摘要

新词语作为人类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新子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科技政治的进步、人们认识的提高,为满足日常交际及思维表达的需要而创构的。它们与词汇系统中的稳定成员相比,心理固化度和规约度相对较低,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鲜活地彰显了人们对现实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踪迹和结果。Aitchison (2001) 指出,在语言现象研究中,要发现变化是怎么开始的,最好趁变化正在进行时去观察。因此,当现代汉语新词语尚处在旺盛的生长期、未能沉积下来之时,对其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构造机理进行动态研究,更容易探求其根源和内涵,不但为整个词汇系统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案,还为更好地透视人类认知现实的踪迹提供依据。

近30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大量涌现引起了语言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他们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其产生的原因与途径、构成方式与表义特征、分类与规范、词源与理据等进行探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现有论著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尚存在不足,理论构建也没有大的突破。大多数研究者或以语言内部构成为主体,或从影响新词语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为主体,对新词语加以描写与分类,但都多以信手例举式、个案剖析式、定性描写式为主,少有学者基于大量封闭语料对错综复杂的新词语现象进行系统爬梳和定性定量分析,更鲜有学者构建理论框架对其认知机制作深入研究。

鉴于此,我们以认知构式语法为理论背景,基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体验哲学的核心原理,以构式观、传承观、压制观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基于认知参照点的多重压传观 (CRP-Based Poly-Coercion-Inheritance Approach, 简称为CPCI模型): 将压制与传承视为一对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反相成,压制是因,传承是果,在认知参照点的转换下,因果关系可以发生变化,果可能变为新的因,从而形成一个多重压传关系。新词语正是人们在体验性范畴化和概念化活动中启

动了存储于心智中的构式网络知识,在不同类型已有构式的多重压传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新创构式。不同的压传力和路径可导致新词语具有不同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在此理论框架下,我们对 12337 条现代汉语新词语分类研究,研究表明:

第一,新造构式受到汉语不同类型的音律、句法、语义压传最为丰富。首先,双音构式与各类句法构式、语义构式均可组配,通过压传作用产生新创构式,其中,与偏正、属种的组配机率最高(63.07%),与动宾、支配的组配机率次之(22.2%),与联合、并义的组配机率再次之(6.96%),其余的比例不足8%。其次,三音构式除了与递续构式不能组配外,可与各类句法构式、语义构式组配,但主要体现在2+1式与定中、属种的组配(56.56%)以及与后缀式的组配(22.30%);1+2式与定中属种的组配(5.17%)、动宾、支配的组配(6.46%)都不多,其余用例更少。再次,四音构式主要以2+2式与句法、语义组配(98.67%),其中与偏正、属种的组配占了绝大多数(81.89%),较少与联合、并义组配(5.99%)。此外,不少新造构式还受到隐转喻、仿拟构式的压传作用,前者使新造构式语义得到引申和转化,导致新造构式中的兼义条目占了绝大多数(97%),后者产生了具有类聚性特征的词语构式家族。此外,大量形式为旧、语义或语用为新的新构式的存在并不支持一些学者提出的“形义共变观”。

第二,缩略构式在音律、句法、语义、语用上受到的压传作用呈现显著的不同。我们认为,缩略构式的形成受到两个原则的限制:最大经济化原则和最大表达力原则(包括认知参照点和统计先用两个准则)。在此认知条件限制下,95.0%的缩略构式受到双音构式的压传作用,且55.80%与状中偏正、动宾、联合组配,由此形成的动词最多(53.87%),38.19%与定中偏正组配,由此形成39.23%的名词,其余的比例则不足2%。

缩略构式变体的形成又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机制和规律。首先,缩略构式以缩合为主(95.84%),并主要以四音原词语构式为缩合对象(87.88%),常形成名词和动词;多音缩合仅占10.20%,几乎都形成了名词,并以专有名称为主。缩合主要受到认知参照点准则第一次准则“首字(词)优先”准则的限制,其余变体主要受制于统计先用准则的制约,四音原词语缩合构式的1+3式(42.66%)>1+4式(23.87%)>2+3式(11.44%)>2+4式(9.85%)梯度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有些缩合构式还受到仿拟构式的压传,形成类聚性词语构式,与新造

构式连为一体。其次,由于受到统计先用准则的限制,截略构式数量很少(1.27%),主要是通过对三音节原词语构式的截略创构新词语,并以“截头保尾式”为主。再次,鉴于统提构式(即“数词+X构式”)的特殊性,我们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统提构式受到双音构式的压传作用形成了以“数 X_1 ”为基式的原型,并在其他构式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构式化变体。统提构式中的数词以二、三、四、五的使用频率最高(82.13%),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人类的“原始数觉”形成的认知模式以及文化模式有关。此外,统提构式中形式为旧、语义或语用为新的新语式的出现也进一步说明形义并非共变观。

第三,外来构式受到的压传作用与新造构式和缩略构式有较大的差异。首先,以语音、书写等形式为参照点形成了纯摹音(形)式,它主要受到源语及汉语语音、书写的压传作用。其次,以形式和意义为参照点分别形成了摹音显义式、摹音仿义式和仿义式。其中,摹音显义式主要受到源语语音语义、汉语语音、书写、句法语义(基本为偏正属种式)的压传作用;摹音仿义式主要受到源语语音、词法和语义、汉语语音、书写、句法语义构式(基本为偏正属种式)的压传作用;仿义式主要受到源语词法语义、汉语语音、书写、句法语义(基本为偏正属种式)的压传作用。再次,以意义为参照点形成了意译式,这是借助本族语构式知识对源语概念再概念化的结果,因而可视为准外来构式,与本族语新造构式紧密相连。在外来构式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还可能以其整体或部分为参照点形成更多的具有外来属性的新词语,与新造构式相连。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还从认知构式观的角度对外来构式重新分类,将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我们的语料分析还表明,外来构式在音节分布上与其他两类显著不同,它并不受到双音构式的强压制,而是呈现出 $3(44.26\%) > 2(28.02\%) > 4(21.75\%)$ 的分布态势,这与其形成的复杂认知参照点有关。句法上,外来构式也表现出显著的特征,以定中偏正式为主(72.61%),后缀式为辅(20.04%),其余不足7%。这一特性决定了外来构式主要以名词为主。这说明,在跨文化交际中,为思维和表达的需要,对新事物、新现象、新思想的命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大多数认知构式语法学家聚焦于超词汇层面的语法构式研究,较少涉及词汇层面的词语构式,尤其是新词语构式的专门研究;其次,对构式如何组配形成新语式的探讨尚且不足。我们基于构式观、传承观、压

制观,首次提出了解释新语式形成机制的 CPCI 模型,一方面将其应用于词汇层面构式的研究,扩大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另一方面修补了构式传承与压制单向运行的不足。

(2) 本研究首次将“CPCI 模型”用于分析现代汉语新词语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机制,探悉新词语的构造特点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认知规律。在理论上为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乃至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并对汉语词汇教学、英汉翻译、词典编撰等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3) 本研究从认知性和概括性承诺出发,以 CPCI 模型中的认知参照点为标准对新词语重新分类,并以封闭语料为支撑对新造构式、缩略构式和外来构式的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压传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佐以翔实的数据。

(4) 研究表明,新词语清晰地反映了汉民族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踪迹和结果,表达了某一社会时期他们如何规约自身对经验的把握,蕴涵了该民族特有的范畴化和概念化能力。这进一步证明了语言、认知、文化的交融关系:我们不但可从自然语言中看到认知能力与文化,也可从认知能力、文化中看到自然语言。借用钱冠连(2002)先生的术语,语言、认知、文化处于一种“全息”状态中。

(5) 研究表明,现汉新词语构式中所存在的通过语用压传产生的形式为旧意义为新的新造构式以及通过压传形成的“数 X 构式”并不支持 Bybee & Pagliuca (1985)、By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Croft (2001) 等人提出的构式“形义共变观”。

我们通过理论反思与现象考察,尝试扩大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将其用于词语构式的描写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不同类型的词语构式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构造机制以及在音律、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特征。但是,本研究还只是初步尝试,尚存不少局限性,如在辞格构式的研究、真实语料的规模、英汉对比研究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 认知构式语法; 构式观; 传承观; 压传观; 基于 CRP 的多重压传观; 新词语构式

Abstract^{*}

As society and cognition advance,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ar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Compared with fixed members of the lexicon system, their entrenchment and conventionality are a bit low. Yet being characterized with the age in which they reflect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technology,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demonstrate the fresh traces and results of people's embodied experiences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Aitchison (2001), in studying linguistic facts, the best way to find out when a change has begun is to observe those facts when the change is in progress. The same applies to lexical studies. A dynamic study of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when they are still in the developing stages will contribute to not only exploring their sources and meanings so as to provide a feasible sol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exicon system, but also providing evidence of how people understand and process reality.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or so, the increasing emergence of new lexical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from linguists. They have ever done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either from a micro-perspective or a macro-perspective, namely on its reasons and ways, structural modes and semantic features, classific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rigins and motivation, etc. However insufficiencies remain in the above studies and so far there are not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gained in theorizing. For instance, most scholars have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either on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onstitution of new words or on a separate explana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al or psy-

* 答谢我的美国朋友 Richard Hartley 和 Rebecca Slormer 对本书英文摘要及书中有些观点指出的宝贵建议。

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orm of causal exemplification, case study or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Systematic,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new words based on a closed corpus are scar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no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to lucubrate their cognitive mechanism.

In order to bridge up the gap, this thesis, 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CCxG),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RP-Based Poly-Coercion-Inheritance Approach (termed as CPCI for short),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Usage-based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Inheritance of Constructions, Coercion of Constructions and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In this new approach, coercion and inheritance are viewed as mechanisms of a dialectical relation in which they interdependently oppos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shifting of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coercion which functions as the cause may transform into inheritance which functions as the effect, thus forming a poly-coercion-inheritance chain. New words are just emergent constructions out of poly-coercion-inheritance of various constructions in embodied categoriz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Different coercive powers and paths may lead to different types of emergent constructions differing in syllables, syntax, semantics or pragmatics.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PCI, this thesis classifies new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into three main types: Newly Created Constructions,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and Loaned Constructions,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ir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CPCI features in syllables,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upported by statistic analysis. It finds that:

First, Newly Created Construction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CPCI from various types of syllabic,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onstructions. First, in CPCI process, disyllabic construction combines with all kinds of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to produce emergent constructions. Thereinto, disyllabic construction easily combines with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genus plus differentia construction,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63.07%; it also combines with VO construction and action-patient construc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22.2%; it combines with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6.96%. Second, trisyllabic construction combines with all kind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uctions except successive construction. But as the data have revealed, “2 +

1" trisyllabic construction mainly combines with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and genus plus differentia construction, ranking the highest with the percentage of 56.56%, plus 22.30% combining with suffix construction, while "1 + 2" trisyllabic construction combines with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and genus plus differentia construction with a percentage of 5.17%, and with VO construction and action-patient construction with a percentage of 6.46%.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types are very low, let alone the rest. Third, quadrisyllabic construction expresses itself in form of "2 + 2" (98.67%), and mostly combines with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and genus plus differentia construction with a striking percentage of 81.89%. It rarely combines with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5.99%). Last, the semantic poles of many newly created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extended and transformed based on the coercion-inheritance of metaphonymic construction, thus producing 97% polysemous constructions out of the whole. And coerced by parodic construction, many tend to form construction families with similar features.

Second,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show different coercion-inheritance features in syllable,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is thesis holds that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are constrained by two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conomy and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xpressive Power (which consists of two maxims: CRP and Statistic Pre-emption). Constrained by those principles, 95.0%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are coerced by disyllabic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 its features. Syntactically, 55.80% combine with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VO construction or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thus mostly producing verbs (53.87%); 38.19% combine with attributive construction, thus producing nouns (39.23%).

The variations of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reveal different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laws. First, blended constructions take the main form of Shortened constructions (95.84%) and have mainly blended from quadrisyllabic lexical constructions (87.88%), a few from polysyllabic lexical constructions (10.20%). The former generally produces nouns and verbs while the latter mostly nouns. Most blended construction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Maxim of First Word Priority, while the rest are constrained by the Maxim of Statistic Pre-emption. This is supported in statistics by the distributive cline of "1 + 3" (42.66%) > "1 + 4" (23.87%) > "2 + 3" (11.44%) > "2 + 4"